

《白夜》与《怀念狼》 意义和价值的再认识

□李星

1995年由华夏出版社首出的《白夜》，2000年由作家出版社首出的《怀念狼》两部长篇在贾平凹至今出版的16部长篇小说中有着重要地位和非凡文学价值，它们或一开始就被冷落，或在“热闹”中被引向寂寞，而它们重要的文学价值却被忽视了，以致评论家陈晓明在2015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贾平凹曾有一部最可能与世界文学潮流接轨的小说，它就是《怀念狼》。”

《白夜》初稿落笔于1994年11月，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即是在《废都》遭受争议之后，贾平凹并没有被汹涌而来的非难和误解击垮，坚持走自己既定的文学之路。早在文坛还在为《废都》热闹的1993年秋天，他就穿越蜀道进了四川，在绵阳参加了自连戏研讨会，观看了五台目连鬼戏，并开始搜集有关目连戏的资料。从1993年10月接到嘉峪关市张三发所寄的《精卫填海》新寓言起，他就有了《白夜》的结尾。《后记》没有提供他开卷的时间，只讲了他在绵阳师专的构思和写作。但1994年他住了半年多的医院，才“决意正式动笔”，说明实际上从1993年夏他就开始构思和写作《白夜》了，“却先后推翻了三次”。推敲这些时间，只是为了说明贾平凹内心是多么坚强，并没有因为《废都》风波而受到多少干扰。

《白夜》中的夜郎与《废都》中的庄之蝶的差别不只在于名人与非名人，还在于他们的生存处境天差地别，夜郎是一个体制边缘、夹缝中的文化人，沉沦于市井，迹近于无赖，却又心慕高雅，欲脱掉自己身上的俗气，似君子又似流氓、小人，像好人又像坏人。

20世纪90年代初的西京城，商品、市场、房地产开发、文艺娱乐化皆已蔚然成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髦口号，造成了文化为发展经济、物质生活服务的扭曲的文化观。《白夜》对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文化观有着鲜明的批评，指出这只能造成目光短浅、金钱至上的小市民文化。在这种社会文化大背景下，夜郎却如鱼得水，活跃一时，但因为缺乏体制与财富背景，他只能属于红火却未能致富的穷文人。有人说夜郎是“盖世的丑陋，旷世的孤独”。他的“丑陋”自然不只是长了一张马脸，也包括他的行为和灵魂；他的孤独也不是因为他精神境界之高蹈，而是源于他对自己的评价与他所处社会地位、所扮角色的差距。他的孤独是一个失意文人的忧愁和伤感。看不起与自己地位相当的颜铭，却高攀着大家才女虞白，或许正是他这个在西京一贫如洗的农民儿子摆脱精神孤独、寻求高枝可依的生存方式。而虞白对他的惺惺相惜式的眷恋，或许也是看错了人，投错了门，即使成婚，也注定不会有好结果。郎是才郎，郎却也有天然的狼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继写《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之后敢于将讽刺批判的矛头指向与自己同类的知识者、读书人的清醒而伟大

的作家。钱锺书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就是批判讽刺自己一类的留洋者。《废都》继承了他们的伟大文学传统，创造了社会历史转型期，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下庄之蝶这个自知沉沦却不能自拔、陷于深沉痛苦之中的文化名人典型，而在《废都》之后，他则将目光瞄向了自己所在的西京文化圈，塑造了夜郎这个既令人同情又不无偏激、可憎的文化人形象。如果了解《废都》当年曾经给贾平凹带来多么大的麻烦甚至是旷日持久的官司，就知道在《白夜》的创作中他是多么纠结和谨慎，其中的苦心和智慧恐怕只有我们这些事中人才略知一二。既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体验，又不能让人对号入座，惹出文学以外的是非，不啻是在荆棘丛中舞蹈。

其实，从《浮躁》以后，贾平凹真正的努力方向，是从已有的长篇小说结构和叙述模式及套路的写作方式中突围，创造出一种长篇叙述的新方式。这种改变讲述人居高临下的“高台”位置，如“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看不出任何技巧的长篇叙述方式，是从《废都》开始的。记得当时就有不少识家发现了他石破天惊、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白夜》乃至此后的《高老庄》《怀念狼》等正是这种语言方式和文体探索的继续，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打上了鲜明而独特的贾式叙事印记。读《白夜》，首先感到的是这种不装腔、不做作、不卖弄的叙述魅力。于极其浅近、日常、平易的言说中，让你感到芸芸众生生存与生命的律动；自然而然而简洁，并不时有智慧的流露，充盈着禅意机锋和哲理光芒。不仅作者自己从中体验着“生活是美丽的，写作是快乐的，人世间有清正之气，就有大美存焉”的心境和乐趣，也让读者有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人情世态，美不尽言之感。

在小说基本情节、故事以外，将中国传统经典、民间传说、神话，引入长篇叙事，或增厚现实故事文化精神的广度和厚度，或使现实生活笼罩在一种幽深奇诡的叙事氛围之中，或以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映衬和观照现实社会的荒谬和丑陋，已经成为贾平凹长篇叙事的鲜明个人印记。这种叙事方式从《废都》就开始了，庄之蝶岳母的神神叨叨、老人会说话、牛皮鼓会示警、货郎传递民意、歌唱民谣等等将一个个当代文化名人的精神沉沦与人生痛苦，融于浓重的现实氛围和民情风俗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中。《白夜》将再生人寻亲、连台大戏《目连寻母》贯穿于全作之中，并与主人公夜郎的人生命运形成一种隐喻映射的互文关系。川剧《目连寻母》的戏文全本我尚未接触过，只从《白夜》所引的片段中看出个大概，依稀演绎的是一个孝子穿越阴阳两界、苦苦寻母的感人故事。《目连寻母》的艰难曲折、再生人团聚希望的破灭，凸显的既是人间的真爱和深情，又是

无限的生的痛苦，希望的难酬。《目连寻母》的结尾借用的是《精卫填海》的远古神话，并让现实的夜郎扮演精卫的角色。《后记》中说这则人生寓言化了的《精卫填海》是从一个甘肃作者处借来的，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颜铭、夜郎、宽哥、吴青朴、虞白等人的人生命运，有着无尽的同情与悲悯。或许这正是无端遭遇《废都》风波，家破（离婚）人病之后的贾平凹的苍凉和忧伤，他把这种心境也真实无欺地投射于夜郎、宽哥、吴青朴、虞白、邹云、颜铭的故事之中。

社会和文坛的浮躁、娱乐文化的汹涌，使许多人正在丧失阅读纯文学的时间和能力，我怀疑正是这种浮躁和功利心，造成了对贾平凹别有心曲、别具新意的《怀念狼》这部大视阈、大境界的作品的种种误解和轻视。其实，只要静下心来，稍有语言和文学敏感的读者，只要开始读前几页，就会为贾平凹独特的叙事语言风采所倾倒。

《怀念狼》是通过一个外塑的视角去讲自己的舅舅傅山的。傅山是20世纪50年代全县闻名的打狼英雄，后来却奉命去保护已面临灭种危险、硕果仅存的10只狼。然而却因为他思维中所存留的对于狼这种动物生命力旺盛、凶猛而又残忍、狡猾的定势最终阴差阳错地将它们全部消灭。从对他狼的恐惧心理中人们读到的不仅是老猎人智慧和意识的褊狭麻木，更是这个当年的老英雄和他的徒子徒孙生命力的萎顿、消弱和无能。学者鲁枢元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茫茫宇宙中这颗地球在它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宇宙生命的世纪，又有过动植物生长繁茂的生物世纪，而今地球圈又进入了一个人类的世纪。“较之其他生物，人类的优越和幸运在于他们拥有了地球的‘精神圈’，然而，人类社会如今所面临的种种足以致人于死地的生态环境，也正是由于人类自己营造的‘精神圈’出了问题”。“人们不仅在征服中失去了‘灵魂’，甚至‘灵魂’也已经被征服欲所充斥。”《怀念狼》中傅山这个形象既是人类的辉煌与勇敢的象征，也是人类专制、麻木、偏执与自身生命力萎顿、心理精神生出了病患的生动象征。这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大背景下，极端发达的高科技、互联网虚拟世界所导致的人类与大自然隔离，以及由此导致的肌体能力退化和生命危机，以至于在多样生物面前丧失了安全感；与之相对的是虚拟世界所培育出的征服力的膨胀，灵魂被物质欲望所淤塞的精神生态危机。精神的生态危机，比自然环境的生态危机，更应引起人类自身的警觉。保护狼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态题材，在贾平凹神秘飞扬的诗意图式、汪洋恣肆的自由想象中，成为对于人类和地球生物的大关怀与大悲悯，对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大批判、大反省。这或许正是陈晓明心目中《怀念狼》的人类价值和世界意义。

现在的中短篇小说，很多在章法上是相似的，相似中自有些道理可讲，但黑龙江孙且的小说与众不同。他写小说，仿佛在讲故事，但故事常断续，你正待往下看，却插入了另一件事。或者说，他不是一个很老实的讲述者。在他的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是经常重复的，例如同样叫马大胖的人，在这篇里是出租车司机，另一篇里却变成了建筑师；这篇里的油漆推销员路西，另一篇里成了县委书记；这篇里承包酒店的刘迪，另一篇里成了韩国房地产公司的会计，用他的说法是：“我的小说，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人物寥寥无几，次要人物也不多，而且二者极易区分，前者有名有姓，后者无名无姓，我关于小说的一个极重要的见解，出场的人物过多，会成为技术上的难题，像人的植物神经紊乱，成为某种疑难杂症。”这可以理解为，他小说中的人物经常是符号化的，而对于姓名这样的符号，他使用起来也是极为经济和吝啬的。此外，他的叙述语句也具有挑逗性，乐于“打岔”，上句说着张三，下句可能转为李四；他惯于换行，对话换行，叙述也不断换行；换行带来转折，你需要在接续的转折中追踪他的文脉和用意。这一切都造成一种特别的效果：你休想哼着小曲欣赏他的作品，休想一目十行，甚至休想读一遍就明白他的意旨。这些情况使我们想起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作品里昆廷既是叔叔的名字，也是侄女的名字；卡迪既是母亲的名字，也是女儿的名字，用一个名字指示两个不同的人物，使读者感到迷惑和恼火，这样却迫使读者不得不一直集中精力，保持警惕。这是一种所谓“困难的文本”，施克洛夫斯基解释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设法延长。”这些迹象表明，尽管孙且用尽量通晓的文字写作，骨子里却是一位先锋意味的作家。

在一个长时期里，中国的乡土小说占优势于城市小说，获奖率也明显高于后者，这是由于乡土文学具有深厚的传统背景，也具有较成熟的故事形态，而城市小说的真正发达只是近年来的事。在城市小说的发育中，不同地域的城市文化特色逐步得到深入地发掘，这其中，孙且的哈尔滨小说无疑展示出他的个人特色。

哈尔滨是一座具有异国情调的美丽城市，不仅荟萃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也因曾有大量白俄定居，融合了中外文化，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从孙且的《安德烈兄弟的房子》在小西木桥《洋铁皮盖儿的房子》等作品的题目上，即可看出他创作的鲜明的地域色彩，他的大量努力，正在于出色地勾画出哈尔滨的灵魂。既是东方小巴黎，就遗留有见过世面的人群，安德烈兄弟就是如此。他们只是钟表匠，气质却是高贵的。他们只修瑞士表，因为修上海表“不值当”，他们并不把表看作机器而视为艺术品，凸显了他们与普通钟表匠的本质区别。他们对待修表，像对待人生一样郑重，严格恪守“一辈子认认真真做人、做事”的信条——毫无疑问，这样的钟表匠，于此后是绝迹了，绝迹了一种大师的风范和精神，也是更值得今人悼念的。孙且的小说，通过安德烈兄弟等人物，

孙且
小说创作

城市之光

□胡平

写出了一座城市永远值得缅怀的无形的文化遗迹。

孙且写哈尔滨又是分解的，多定位唤作“偏脸子”一带的城市区域——这与其他作家写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哈尔滨的文化性格是混杂共处的，走出五里便呈现不同的面貌。孙且专写“偏脸子”风格的哈尔滨，是一种深入的创造，开创了中国城市小说的新视野。按照他的写法，若写老北京，小说也可细化为表现“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不同类型，所以，他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孙且的作品，不少取材于童年记忆的场面，那不仅出于怀旧情愫，更出于对一座城市文化个性最鲜明时代的留恋和追寻。他善于写那个时代的“边角人物”，他们代表了“偏脸子”式的生活。这些芸芸众生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希冀，都活得不容易，各自的故事集合起来，展示了城市底层生活的卑微与芜杂。作者对于下层百姓的命运寄予了深厚的同情，特别表现在《向北，向北——》等作品中。《向北，向北——》里的街道和房子修在偏僻地上，五色人等居住在废旧火车库附近，姓名皆为井老二、刘老爹儿、老井婆子、四歪歪、嘲喇蜜之类。这些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他们比今天的贫困人群更加不幸，但作者也写出了他们精神上的高贵。可以认为，相对于其他一些城市小说，孙且的作品是比较成熟的，成熟在审美形态。有些作家虽然也在写城市，可是对城市缺乏感情，只愿写城市的罪恶——而小说只写单面的恶是难以饱满充盈的。孙且的秘密在于，他写城市，亦如乡下作家写乡村一样，永远怀有同情和温情，这使他作品的批判性主题也被表现得醇厚而富于感染力，因为他生长于哈尔滨，爱哈尔滨，也爱哈尔滨人，他的成功部分源于他的出身。

孙且处理现实城市题材，眼光要复杂一些，这种复杂性，根植于现代人性的变迁与异化，所以，他笔下常出现怪诞的人物和不经的举止。在这些作品中，孙且的眼光显示出不寻常之处，他似乎是一个惯于发出冷笑的作者，又冷眼看世界，看见了现代人种种可笑并可悲的、自身浑然不觉的异样形态，他的小说，也就成为一面面光怪陆离的现实镜像。当然，这类作品中有些仍蕴藏了炽热的温度，如《红山果》中，“我”与妓女露露的情感交织，仍具有古典的浪漫色彩。他们的关系确有奇怪之处：两人同居在一起，男方会拿出日常开销费用，而女方每天还会打扮出门操持皮肉生意；但其中有转折：露露终于主动亲吻了“我”，退回钱物离开了自己爱上的男人。这些作品表明，孙且在把握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是谨慎的，也是持守的，他的城市故事，最终因寻找属于自己的美学形式而获得圆满的表现。

最后还应该提到，孙且所运用的纯然哈尔滨化的语言，也为作品增色，这些本土语言是口味很重的、不易混淆的，它们是小说成品的绸缎面料，摸上去光滑细腻，给读者带来特殊感受。

他的小说也有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之处，那就是缺乏某种程度的有益的顺畅，思路和叙述上的顺达，尽管不排除他的有意为之。他不应过于自信，也不应过于挑战读者的耐心。改善这些，他将获得更为广阔的创作前景。

李廷舫《河套母亲》

彰显民族精神的中国故事

□刘志中 刘文斌

李廷舫的长篇小说《河套母亲》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叙写了内蒙古西部河套平原的婆媳二人，从1930—1980年代经历的曲折动人故事，真实反映了河套地区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优秀作品。

河套平原背靠阴山，面临黄河，不但土质肥沃，而且水利资源得天独厚，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广大农民过着缺吃少穿的苦日子。新中国成立后，河套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小说告诉读者，河套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英勇奋斗得来的。早在1927年，这里便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农运、学运和兵运。1939年傅作义将军率部进驻河套，邀请共产党人参加部队政治工作，激发了广大官兵的抗日斗志。取得了突袭包头、会战绥西、光复五原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1940年，蒋介石委任“中统”头目张钦为绥远省国民党党部书记，张钦率一伙特务来河套后，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英勇地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为反抗日本侵略者献计出力，并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读者从作品中不难体会到，尽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牢牢控制了政权、军权，共产党明显处于弱势，但共产党的声威无处不在，共产党人的言行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人心丧尽，必将垮台。

《河套母亲》中的主人公白三女及其儿媳郝玉润，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两位河套女性形象。艰难的生存道路和丰富的生活阅历，炼就了白三女刚毅坚强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从小和婆婆一起生活的郝玉润受其影响，“看似柔弱”，其实“内心很强硬”，又“有情有意”，宽厚待人。婆媳二人多次身处逆境，却始终坚韧不拔，“咬紧牙撑着这个家”，终于走出困境，并将两个孩子兰兰和生生培养成才。她们看到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高远、清冽、绮艳的魂魄哨声

□张学昕

“地域”赋予作家的意义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甚至是终身的。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精神基调和美学取向。在“东北”这片寒冷而沉厚的土地上，曾经飞扬出许多异常高远、清冽、绮艳的文学灵魂的哨声，它们以特别的韵律，唱响在中国文学的星空。无疑，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因之而来的独特地域风俗民情，赋予作家特别的灵感和激情，正如烟花春雨的江南和荒寒多沙的西北，这丰饶而寒冷的东北大地，将它惨烈而绮丽的风格赋予它的子民。于是，我们才得以看到那“萧红式”的惨烈的诗意在“生死场”中闪烁，也才有幸听到那科尔沁草原上的歌手所唱出的“北方是悲哀的”“端木式”的忧愁。同样，当我阅读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辽远的寒冷的土地所特有的诗意与深沉，这种沉郁的抒情美学，几乎遍布于他所有的文字中。

吕天琳的这部散文集，按照所涉的主题与表达方式分成四卷，各卷当中都有十分出色的篇目，将其所思所感与追忆表达达到令人赞叹的高度与深度，同时也隐露出一个诗人对现实清醒的思考精神，对真与善强烈的感知和追慕，对逝去的时间与亲人的深情怀恋，对艺术之美的沉醉与忘情。我感觉，吕天琳对童年的追忆部分写得最好，最率真，最倾情。在《消逝着的流年》中，他写姥爷的种大烟、扎大烟，以及“我”怎样去给姥爷买大烟的情景，传神而温暖，他的叙述，完全超越了人们通常对罂粟这种“恶之花”的表面理解，而是竭力凸显人性的深邃与美好。

《消逝着的流年》对“姥爷”种大烟、扎大烟的追忆，充满着无限的诗意与怅然，那是“萧红式”的对“北方”的令人神往而心醉神迷的表达。于是，我们看到了吕天琳笔下的“北方”，那是同《呼兰河传》里外祖父的“花园”一样的奇特——“大烟花儿上的露水正是晶莹明媚”，“麻雀在大榆树的梦境里啁啾”，“柿子已经上架了”，“黄瓜尚在热烈地开着花”——这“明媚”而“哀伤”的调子，有着催人泪下的悲悯，蕴藉着特殊的北方大地放达的况味。显然，这表达纯粹是属于北方的，吕天琳与那些长年浸染于绿树花海的南方作家不同，那种烟花春雨的“美艳之至”属于另一种美学风格。而这些对北方的自然景观有着奇特的表达的作家，他们都有极其罕见的艺术直觉，能够准确地捕捉到北方的诗意本质，“寒冷”与“明媚”同时透着“感伤”的烟云和雾霭，在他们洁净而高远的文字缝隙间轻扬、弥漫。

同属于这种追忆风格的，还有《后花园记》。《后花园记》表现的是“生”与“死”的永恒主题。这里的“后花园”，不是真正的“花园”，而是“墓园”——一个连接“生”与“死”的象征性的存在。它静静地躺在城市的近郊，是“城市”最终的“归宿”。所以，它也是人类在浮躁的生命之中，最能得到宁静的“精神花园”，灵魂的安栖之所。当作者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座“生”与“死”的“花园”——无疑，这里也埋藏着最静谧而深沉的生命哲学。

回望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尤其探寻散文的境界，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鲁迅给我们开辟出的两个走向：一个是《野草》那样离开“日常”，在哲思中进行灵魂勾勒，精神取舍，因之而生的“诗意”，这是绮丽而极端“陌生化”的文本；一个是《朝花夕拾》那样深入“日常”，散发着浓郁情怀和体温的表达，因之而生的“诗意”温暖而沁人心脾。《苹果为心而甜》便属于后一个走向，它在对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的重现之中，流淌出温暖而感伤的诗意。仿佛鲁迅的《社戏》——“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我”也实在再没有吃到那生平第一次吃到“苹果”的除夕夜似的“苹果”，“苹果”永远地失去了童年的“除夕之夜”才有的味道，因为，那是属于时间的“苹果”，它青春小鸟一样一去而不回了——

“亲爱的苹果。我真不知道现在吃苹果怎么就没有先前那种特有的味道了，难道苹果也有时间概念吗？这些也许就是我每次吃苹果时连籽儿也吃下去的缘故吧。因为我总想把那份遥远的甜蜜永久珍藏并种植在心田里，培植起一棵枝繁叶茂的苹果树……”

在追忆、怀旧的诗意之外，吕天琳对日常之中发生在身边的无数事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洞悉与思索，他从容、深入地将这些思考，以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便成就了他这部散文集第二卷中的大部分篇目。《别说我不懂消费》《世界杯的看客》《强盗波尔卡》《甲流之恶》《泛滥的广场》等，都带有鲁迅式的警醒，对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日常状态给予深刻的解剖，显然，这种批判的眼光需要深刻的洞察力，缺乏反思精神的作家，是无法做到的。其中，《诗人的自杀倾向》对文学界的观察与分析尤为深刻，也对国民的从众心理做出了独特的反思。

显然，吕天琳对社会事件与日常的审视，延续着鲁迅的精神命题，他不喜欢退却的人生，也不喜欢过于悲壮的牺牲，鲁迅是讲究战略的，一定是要保存体力与生命，与他的对立面斗争下去，更不会轻易选择死亡，让自己的对手高兴，而要理直气壮的生存，即使不能复仇，也要让恶的势力不能畅快。在对人物命运形而上的凝视中，吕天琳延续了前辈作家最宝贵的精神、意志品质的衣钵。

《伐掉那棵圣诞树》，则对当下国人的庸俗与从众心理，缺乏真正的内心信仰，以及过于庸俗的商业化品格，表现了厌恶的情绪。看得出，吕天琳向往高贵的、独立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他的愿望，也是当年鲁迅对我们健康的民族性的深切期许。也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感知到这种精神、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伴随着对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的深入探察，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讲，吕天琳的这些表达，在当下，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高尚和美好，是不可或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个作家的担当和使命。于是，吕天琳深情地发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的哨声。

《伐掉那棵圣诞树》，则对当下国人的庸俗与从众心理，缺乏真正的内心信仰，以及过于庸俗的商业化品格，表现了厌恶的情绪。看得出，吕天琳向往高贵的、独立的民族性格的形成，他的愿望，也是当年鲁迅对我们健康的民族性的深切期许。也许，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毫无特别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吕天琳发现了我们的民众在当下的种种问题和精神困扰，感知到这种精神、灵魂荒原地带的令人恐惧。伴随着对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的深入探察，我们看到了许多触目惊心的灵魂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讲，吕天琳的